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2):36~41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边疆治理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的作者分别来自贵州、浙江、云南三省,两篇是关于古代边疆史的研究,一篇是关于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刘海霞博士不但擅长历史实证研究,还善于边疆理论研究,本期的论文便是关于七十余年来国内外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研究的述评。张婷是一位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尤淑君教授的精心指导之下,其本科论文长达50余页,所撰写论文获得南开大学史学新秀奖,其史学功底深厚,见解独到,令人赞佩,其发表在本期栏目的文章是有关18世纪中缅边界汉奸现象的研究。李达老师的研究方向为边疆基层治理与公共管理,曾主持和参与课题多项,是一位不断在学习和思考中快速成长的青年教师,其与王俊程教授发表在本期的文章是关于边疆地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选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近七十年来国内外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研究述评

刘海霞
(贵州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政策之一,封授政策历来备受关注。目前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较为深入,特别是对于唐朝羁縻府州、官制、民族关系、内政外交等方面与封授政策相关的研究把握较全面,呈现出多种观点;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学者在介绍日本、美国的成果方面迅速跟进,突破了中原模式视角;日本的研究较为前沿,对册封地位的界定较高,将其拔高到体制层面;欧美的研究由于立足点多在本国,观点上与中国学者差别较大。

关键词:唐代边疆;封授政策;国内研究;国外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36-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08

The Research Review on the Frontier Investiture Policy of the Tang Dynasty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Seventy Years

LIU Haixia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18)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policies in ancient China, the investiture policy has alway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s. At present, the mainland researches are profound, especially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prefectures with investiture policies and many viewpoints are concluded. Scholar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do a lot to introduc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nvestiture policies from Japan and America. Comparatively, the research from Japanese scholars is the forefront and the research view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re greatly different with those from Chinese since their researches are limited in their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frontier of Tang dynasty; investiture policy; domestic research; overseas research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政策的探讨方兴未艾,对于治边政策在治边实践中作用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其中册封与授官(以下简称“封授”)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引起了学者们的关

收稿日期:2016-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封授与唐王朝治边思想研究”(15CZS046)。
作者简介:刘海霞(1980—),女,河南义马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历史与文化,中、朝、日国际关系史等研究。

注。中国古代的封授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唐代是边疆封授政策走向成熟的朝代,因而是研究边疆治理政策的一个较好的时期。以往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将唐代封授这一政策从纷繁复杂的边疆历史中解析出来,有利于后世学人对其开展深入研究,以见其全貌和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一、国内学者对于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的研究

唐代边疆的封授政策,广泛应用于朝廷内部、羁縻府州、藩国、不隶属于唐的政权等各个层次。国内学者对这些层次的册封和授官都有一定的研究,以下进行介绍。

彭建英博士所著《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1]一书专辟一节讲"册封"。彭博士所说的册封,实际上包括本文所说的册封和授官两个层次,讲的是封授的整体。她认为,册封是李唐王朝强化与周边少数民族上层之间关系,从而构成边疆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的一种手段,并将唐朝的册封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对羁縻府州的少数民族酋领的册封,占所册封人数的大部。第二,是对内附并任职于中朝的少数民族酋领及其子弟予以册封。第三,是对尚未与唐王建立隶属关系、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君长予以册封,建立和巩固友好关系。第四,是对已降附或归附但对其部并未列置州县的少数民族政权上层予以册封。册封是与设置羁縻府州、和亲、通使乃至盟誓等羁縻方式相结合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册封是其他羁縻政策的辅助和补充形式,而不可能单独实行。《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是对羁縻政策开展的系统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封授政策和边疆治理来说,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李大龙先生所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一书也专辟一节讲"册封、和亲与藩属关系的协调"。李先生在著作中对册封的政治含义进行了定义,他所说的册封实际上也包括了本文所说的册封和授官两个层次。他将册封分为两类:"其一是授予藩属边疆民族首领一般的地方官职或散官,如羁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及一些并无实际职权的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等;其二即是册为王或可汗,也即是一般所说的册封。"[2]294李先生列举了册封政策涉及的藩属边疆民族,分析了册封政策在协调藩属关系中的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唐代的边疆封授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此外,李先生在《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一文中,对册封朝贡与藩属体制的关系进行了解析,认为"册封并不是单纯存在于历朝各代与边疆民族乃至邻国之间的一种制度,同时历朝各代对边疆民族乃至邻国的册封实际上是王朝内部的册封制度延伸到了边疆治理之中,是历朝各代为维持藩属体制而采取的众多政策中的一项,与藩属体制相比它不是一种政体而是藩属体制之下的政策"[3]。这些相关理论探索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对于羁縻州内封授的相关研究,以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4]为较早,此论著是对唐朝羁縻府州的总体介绍与评价,对羁縻府州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其中涉及与羁縻府州相关的唐朝的册封政策,并认为册封是唐朝开展边疆民族统治的重要手段。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唐代全部羁縻府州的考查,涉及面广,考述翔实,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羁縻府州的著述。在书中,刘统继承了谭其骧先生对封授的定位,将其作为唐朝建立对边疆统治的有效羁縻手段,强调必须与其他手段并行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除上述之外,田继周等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香港大学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册封与羁縻制度。马驰、马文军的《唐代羁縻府州与中央关系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林超民的《羁縻府州与唐代的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 年第 5 期),李鸿宾的《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方铁的《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2 期)等也从民族政策、民族关系、边疆治理方式、统治理念等不同角度分析了羁縻政策与封授的实行,为全面解析封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由于唐朝在羁縻州的都护系统中也实行封授,故而对唐朝都护府、都督府的研究与封授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也很多,如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正》(中华书局,1958 年),这类研究属于早期对于都护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然而有待

于进一步深化。另外,唐启淮的《唐代都护府述略》(《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和《试论唐代的羁縻府州》(《湘潭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是两篇较早的全面论述羁縻州都护府的文章。以上著述多少涉及边疆封授政策,但用墨不多。

李大龙先生所著的《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是研究都护制度的综合性成果,该著述对都护受到的册封也进行了细致的考查求证,为继续研究唐朝的封授政策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和可参考的观点。他的另一著作《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与《都护制度研究》属同一系列,都是通过对边疆统治方式或者事件的考查来探讨唐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其中,《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详细总结了边疆民族与唐朝之间的互使事件,当中对于册封使者的介绍、总结和分析对于考究唐朝的封授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研究都护的著作之外,还有诸多分门别类的相关研究,如黎虎的《唐代边境镇抚机构——都护的外交管理职能》(《人文杂志》1998 年第 6 期)、赵云田的《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薛宗正的《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苏北海的《西域历史地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年)、郁贤皓的《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吴玉贵的《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载于《中亚学刊》第 2 辑,中华书局,1987 年)、柳洪亮的《安西都护府初期的几任都护》(《新疆历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苏北海的《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及其所属都督府州考》(《喀什师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杨建新等的《唐代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载于《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孟凡人的《唐北庭都护府建制沿革》(载于《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谭其骧的《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载于《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 年)、樊文礼的《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民族研究》1993 年第 3 期)、李鸿宾的《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王怀中的《唐代安东都护府考略》(《禹贡》第 6 卷 3 - 4 期合刊)、金毓黻的《安东都护府考》(《制言半月刊》第 40 期)、方国瑜的《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1982 年第 5 期)、王世丽的《安北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等。这些著述是对唐朝边疆状况的综合性把握,有助于认识封授在都护地区的推行状况,然而对封授政策只是提及,尚未深入。

考查唐朝对边疆的封授政策,必然要对封号、官职等进行解析。这方面可参考的重要资料很多,直接相关的资料有杨光辉所著的《汉唐封爵制度》[5]。该著述详细考证了汉至唐中央王朝内部与外部政权所获得的爵位,考查了封爵的形式,封国、食邑户及衣食租税,封爵的授受、传袭及推恩,封爵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封爵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作者将册封作为从中央王朝内部阐发而形成并应用于边疆地区的制度,将中原王朝的内政与边疆的政策相联系而进行阐述。香港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对得到封授的两千五百余名蕃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其中涉及官职、地位等内容。其他可参考的有马驰的《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 年)、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 年)、韩国磐的《唐代的食封制度》(《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吴宗国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陈志坚的《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李方的《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等。

可以说,国内学者对羁縻政策、羁縻府州、都护制度中涉及的封授政策的相关研究较为全面,有关唐朝边疆与封授的内容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借鉴。然而,由于资料驳杂不易整理,也给系统认识唐朝的封授政策加大了难度。

在羁縻府州之外,特别是在被确定为藩国的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并未被正式纳入唐朝羁縻府州统治或仅仅名义上被纳入羁縻府州统治的民族或政权。这些地方,唐朝尚未设立州郡,即使它们有内附的倾向,唐也没有完全的控制力。唐对这些政权或民族的封授具有不同于羁縻府州的性质和目的,封授的灵活性也更强,往往随着局势的动荡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且封授的效果受局势变动的影响也更大。

通常,这一部分政权也被作为实施羁縻政策的地区,但是属于羁縻政策实施的外围地区或第二层次,即藩属体制中的“藩国区”。这一层次内的民族或政权可以依照其与唐朝的关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向唐朝称臣的政权,如薛延陀、南诏、百济、新罗;和唐朝保持“舅甥”关系的政权,如回纥;保持“敌国”关系的政权,如唐蕃战争中的吐蕃、唐初期的突厥汗国等。[2]294有关这一部分政权或民族得到唐朝封授的直接研究成果较少,间接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周伟洲的《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王尧和陈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 年)、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正》(中华书局,1958 年)、李大龙的《由使者来往看唐朝与薛延陀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 2 期)、陈亚艳的《从唐与吐谷浑的关系看唐对吐谷浑的民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林幹的《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薛宗正的《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和《吐蕃王国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 年)等,上述研究成果为界定封授的性质、变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借鉴。这些地区与羁縻府州存在着相互转化的现象,状况复杂,封授的情况也相应复杂,因而把握起来不太容易。

对封授产生的思想基础的分析,国内学者的意见大致统一,多认为是“华夷思想”①、“服事观”(可参见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羁縻”②等的作用,都与中原王朝对于边疆民族和地区的地位界定相对应。与封授、唐朝边疆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有其他许多著作及论文,如黎虎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杨联陞的《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诠释》(载于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喻常森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等。

研究唐代的封授政策,不能脱离唐代民族关系和边疆政治局势的大背景。与唐朝边疆相关的研究著述众多,除了上述列举中涉及的一些,还有诸多论著,如《隋唐民族关系探索》(崔明德著,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 年)、《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翁独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中国民族史概要》(王钟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史念海著,重排本,商务印书馆,1999 年)、《中国历代民族史——隋唐民族史》(卢勋、萧之兴、祝启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中国边疆经略史》(马大正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田继周等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等,多涉及封授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为封授是开展羁縻统治的手段之一,所起到的作用应放到民族关系和边疆治理中来考量。以上著述中直接涉及封授的解析则较少。

二、国外学者对于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受西嶋定生两篇奠定“册封体制”与“东亚文化圈”理论的论文——《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6]、《东アジア世界と册封体制》[7]的影响,日本掀起了讨论东亚文化圈与册封体制的热潮,这一讨论涉及的册封多限于日本、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这一“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成为有关历史学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西嶋定生认为,中国王朝通过“册封体制”这一由于册封王侯而形成的包括国际性文化传播在内的体制,开展与周边诸国之间的政治性运作,使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得以按照君臣关系的秩序传入周边诸国,其中唐代及之前的东亚世界历史都是以册封体制为枢轴发展起来的。西嶋定生将册封的地位提得很高,几乎将册封作为其东亚世界论的唯一根据。

①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很多,如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②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很多,如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日]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然而,西嶋定生的理论同时也受到藤间生大①、鬼头清明②等人的批判。之后的堀敏一、金子修一等人探讨的范围则大大扩展,同时也讨论了册封与唐朝的边疆政策。其中,堀敏一对西嶋的“册封体制”有所修正,提出了“羁縻体制”的说法,探讨了除册封之外的其他羁縻形态,认为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册封,还包含从羁縻州到单纯的朝贡等多种形式,它们随着中国与各民族之间的实力关系而呈现多种形态,并因此而缔结比较宽松的关系。另外,唐代始置的羁縻州作为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的重要设置是值得关注的。除此之外,堀敏一将册封可汗也作为册封的内容之一,不独限于王侯。[8] 金子修一则更进一步将册封涉及的“王”的概念细分为“本国王”“德化王”,将册封施行的区域扩展到唐代的北亚与中亚。[9]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学者对于封授政策的研究,成果丰硕,且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雄厚。然而应该看到,日本学者主要关注册封本身,采用的是日本视角或宏观的东亚视角,至堀敏一又解析了羁縻制度、授官等与册封密切相关的内容。日本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东北亚,对于封授的界定和中国传统的“华夷思想”的解读,往往与现代的国际关系概念混淆在一起。

与东方视角明显不同的是,欧美学者对于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封授注重的是从外部着手来分析,并且同时注重统治者个人因素、普通民众心理、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方面。特别是善于发现一些唐朝统治边疆政权的“反证”,或者说实际上不存在唐朝集权统治的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边疆政权的平等交往。如《剑桥隋唐史》将吐蕃、南诏界定为与唐朝对等的国家,认为其在唐朝试图构建的藩属体系中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自由选择与周边其他民族或政权的交往,所吸收的文化复杂多样,并不限于中华文明。在提到封授时,并不以唐朝的居高临下为说明点,反而注重封授实际效用的有限性。费正清的《中华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外交关系》(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即为此类的代表。

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唐代封授史的成果较少,但视角独特,很重视与西方古代史的比较,注意将古代中国放在世界体系而不是亚洲体系中去研读,更关注宗教与文化的作用。这一点从 S. A. M. Adshead, *T' ang China—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唐代——世界史上的东方崛起》,Palgrave Macraillam,2004),Mark Edward Lewis,*China' s Cosmopolitan Empire—The Tang Dynasty*(《中国的世界帝国——唐》,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和 Victoria Tin - 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古代中国的战争与城市形成及早期的现代欧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可以体现出来。应该说,欧美学者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视角解析唐朝的封授政策与边疆关系,然而由于出发点的分歧,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三、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研究之展望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关于封授政策的研究涉及羁縻府州制度、都护制度、职官制度、藩属体制、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成果显著。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对唐代的边疆封授政策本身的研究还没有走向深入和系统,也未将封授单独从各种体系中提炼出来详加分析,且观点也存在较大差异。③ 国外学者关

①具体观点可参见[日]藤间生大:《东亚世界的形成》(春秋社,1966 年)第一章第一节《五、六世纪的东亚与日本》,第二章第一节《东亚各族、各国结合的种种契机》。

②具体观点可参见[日]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校仓书房,1976 年)第一部《关于日本古代国家的国际条件——视角与课题》。

③单纯从册封来讲,中国学者的观点就存在着诸多分歧。高明士与李大龙将册封作为唐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的一种方式,而韩昇认为册封这一方式在唐内政与外交均存在。在具体分析中,高明士与韩昇都偏重于分析东亚的册封关系,对西北、北部、西南、东南的关注明显不足,而李大龙相对来说更为全面。三位学者对唐朝天下图式的描绘与阐释也不同,分析册封时的角度也不同。李大龙致力于勾勒一个全面反映唐朝内外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藩属体系,将册封与和亲界定为唐朝协调藩属关系的重要手段;高明士将天下秩序细化为三大层次、七小层次的结构,将册封作为君臣关系形成的标志,认为其是中国天下秩序形成的基本要件之一;韩昇将册封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官职政治制度的一种形式,注重对册封体现的文化因素的分析。

于封授和唐朝边疆理论的构建较为系统,然而对封授政策本身的关注与理论相较则显出不足,是将封授作为一种体制或者制度来讲,不是对具体的封授政策内容及其演变进行研究。事实上,封授是一种政策,是政治体制的表现,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虽然独特,但将封授理解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方式,这种“中外交流”的观点明显不符合我国古代传统封授政策的实况。

从以上回顾能够看到,对于唐朝的封授政策,尚有以下可拓展的空间:从研究现状来看,首先,大陆学者对于唐朝羁縻府州等方向的把握较深入全面,相关成果可以作为对唐代边疆封授政策具体专门性研究的基础。由于观点多样,可以多方引验和互相印证,以见较为客观的唐代边疆封授史,研究视角也可以试着突破多以年代为准绳的平面化梳理。其次,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学者在介绍日本、美国的成果方面迅速跟进,以突破了中原模式视角和大中华观念,然而也存在着不够细化的遗憾,这些正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多维视角,突破思维的局限。再次,日本的研究较为前沿,然而对册封地位的界定过高,将其拔高到体制层面,这为我们深入思考封授作为一种政策而不是体制的深层原因。最后,欧美的研究由于立足点多在本国,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解析尚待深入,观点上与我国国内学者差别较大,为多元化地开展研究奠定基础。

我国传统史料中,虽然直接以册封、授官为主题的并不多见,然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通典》等有关边疆民族得到唐朝封授的记载,特别是《册府元龟》的“外臣部”中专辟三节记载“封册”,为后人系统认识封授政策提供了可能性。总体看来,唐代的边疆封授政策尚有较大可拓展的空间。而以往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内学者与日本学者、欧美学者的研究也是本选题开展研究的坚实基础,在研究中各种观点可以共同促进,进而推动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研究的深入。

事实上,对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的研究,不仅是对目前兴起的研究历朝的边疆治理政策热潮的一个回应,对于当今边疆地区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封授是边疆治策中柔性的一面,因而对边疆封授政策的研究对于今天在政治、文化层面技巧性地处理中央与边疆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探讨深化改革方案都不无裨益。因而,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唐代的边疆封授政策是很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彭建英. 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李大龙. 汉唐藩属体制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李大龙. 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J]. 学习与探索,2007(4):223-231.

[4]谭其骧. 唐代羁縻州述论[G]//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 成都:巴蜀书社,1990.

[5]杨光辉. 汉唐封爵制度[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6]西嶋定生.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1 巻 中国古代帝国の秩序構造と農業[M]. 东京:岩波书店,2002.

[7]西嶋定生.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3 巻 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M]. 东京:岩波书店,2002.

[8]堀敏一. 隋唐帝国与东亚[M]. 韩昇,刘建英,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9]金子修一. 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M]. 东京:名著刊行会,2001.